

宋季三朝「士風澆薄」與國運存亡述論

吳業國 華南理工大學

宋末元初著名文學家方回(1227-1305)在反思宋季三朝(理宗、度宗、端宗)歷史時,直言「人才消長,世運之消長系焉」^[1],王朝政治的興衰和人才的消長緊密相關。

人才的重要性,成為歷代君主與士大夫群體的普遍共識。然而,趙宋末年困於人才匱乏,素有「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2]的時評。有關宋代士大夫群體特徵、黨爭與國運發展存亡的研究,近些年來,間有學者關注。

^[3] 本文則圍繞南宋末年限宗、度宗、端宗三朝的「士風澆薄」問題,探討時論中「江南無人才」的原因及其對當時

士風的影響,進而分析其與趙宋衰亡之間的關係。

一、「江南無人才」釋義

宋代科舉勃興,士人踴躍仕進,加上兩宋三百年間「待士大夫以禮」^[4],造就了宋代人才繁盛的局面,受到後人的傾慕。如明代學者徐有貞指出,「宋有天下三百載,視漢唐疆域之廣不及,而人才之盛過之。」^[5] 史學大師陳寅恪指出,華夏文化歷千載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6]

這些都說明在學校、士子的數量以及文化水準上,趙宋超越漢唐,然而卻無法解讀南宋末年的孱弱與衰亡。

摘要：趙宋「崇文」風氣涵育中成長起來的儒家士大夫,素有「心懷天下」之志,在宋季卻呈現出「賢者」與「不肖者」的顛倒錯位。賢者如江萬里、文天祥、謝枋得等人,都具有出色的吏治才幹,懷「致君堯舜」之心,卻難以改變當時社會中頹敗的士風;不肖者如梁成大、薛極等人,破壞了北宋以來士大夫的剛直銳氣,與構成士大夫主要群體的隨波逐流的「中人」一起,形成宋季「士風澆薄」的局面,給宋季三朝政治帶來非常嚴重的惡果。宋季「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的哀嘆,注解了宋季「江南無人才」這一時評。「江南無人才」論在宋末被時人集中拋出,也成為國之必亡的佐證。

關鍵詞：宋季三朝(理宗、度宗、端宗);江南無人才;士風澆薄;國運存亡

首先,各個時期人才的數量多寡不均。如,史臣在《宋史·奸臣傳序》中對宋代人才多寡與消長規律做了概述:「終宋之世,賢哲不乏,奸邪亦多。方其盛時,君子秉政,小人聽命,為患亦鮮。及其衰也,小人得志,逞其狡謀,壅闕上聽,變易國是。」^[7] 宋季三朝人才更是稀少,世間多「弊衣菲食,高巾破履」^[8]的道學君子。

史書讚譽有加的喬行

簡、杜范、李宗勉、吳潛等正人,也少有建樹。形成「小人得志、君子在野」的局面。

其次,人才壅塞成為時人共識。端平元年(1234),魏了翁應詔上書言事,向理宗(1224-1264在位)描述北宋元祐年間(1086-1094)人才濟濟的盛況,盛讚司馬光、文彥博、蘇軾、呂公著等人,理宗心生仰慕:「元祐人才如此」^[9]。理宗君臣身處的時代,元祐與乾道、淳熙,已成雲煙往事,對人才頹敗毫無良策,且形勢不斷惡化。到度宗咸淳年間(1265-1274),人才譴陋的現象



尤為嚴峻。朝臣程東鳳上書度宗皇帝，表達了自己的激憤之情：「臣伏念國無賢才，何以為治？為治尚不能，況兼欲撥亂乎？臣觀此江南半壁，可謂無人矣」^[10]。

此一「國無賢才」的衰亡局面，使宋亡之際歷經血淚的忠義之士與入元遺民的痛苦尤為深切，其言辭淋漓盡致。民族英雄文天祥縱有救國心，卻只能仰天長嘯「東南那個是男兒」，「甘心賣國人何處，曾識蘇公義膽不？」^[11]可謂義憤填膺。然而，也只能悲歌「哀哉！吾國之無人」^[12]。對於度宗以來的國勢，鄭思肖論道：「權臣持國，士氣沮喪」，最終形成「德祐莫大之禍，不可救藥！」^[13]疆域的日益淪喪使文天祥、鄭思肖、謝枋得等人，憤而抨擊人才壅塞的局面。然而，在宋季危亡情勢下，徒有感嘆與批評，均於事無補。這一讓人窒息、令人絕望的社會環境，使得人才變成了庸才。面對壓抑沉淪的官場，眾多正直擔當的士大夫無所適從，紛紛走向迷茫躑躅。陳亮有言：世間不乏人才，卻「每視人主之心為如何？」^[14]

「江南無人才」論在宋季被時人集中論爭，成為國之必亡的佐證。宋季三朝衰世中的士人，既無盛世的豪情，也無亂世的機遇。「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15]，成為末世風俗。宋季士大夫完全失去了北宋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等「憂樂天下」的責任感與「同治天下」的主體精神，^[16]在人格上呈現出「賢者」與「不肖者」的顛倒錯位。

二、賢者不得行道

古代中國諸多衰世「無人才」的局面，並非人才難得，而是因為忠心耿耿、不合時宜者被壓制和拋棄。從今存史料看去，趙宋末年頗多學養深厚、富有才幹且忠君愛國的士大夫。以下是幾位時賢的不幸遭遇。

江萬里(1198-1275)，字子遠，籍貫江西都昌，少時即「神雋有鋒穎」，理宗在東宮時頗為仰慕，曾經「書其姓名於幾研間」^[17]。寶慶二年(1226)

中進士，先後任吉州與隆興知府、尚右兼侍讀、監察御史、右正言、殿中待御史等職，官至左丞相兼樞密使。淳祐元年(1241)，江萬里創白鷺洲書院，倡士氣、正文風，砥礪造就了歐陽守道、文天祥、劉辰翁、鄧光薦等一批名臣大儒。其治學「自成一家」^[18]，言行文章深受時人欽佩，為官為百姓稱道。淳祐五年(1245)，為了彈劾林光遷等趨炎附勢，上書理宗啟用趙葵，「議論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19]招致諸多奸佞之臣的嫉恨，因母喪未及時奔喪而遭彈劾，被閒置十二年。

在賈似道權勢熏天下、百官緘默不言之際，江萬里則「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20]，不顧自己的安危得失，力挫其鋒，維護了度宗的尊嚴，見其過人的膽識與才智。「帝在講筵，每問經史及古人姓名，賈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答。」^[21]賈似道對他嫉恨日深，在其牽制掣肘下，江萬里不得不四次上書避退，未再出仕。文天祥讚其「早以言語妙天下，中以政事動中期，後以氣概風度上結人主之知，而下為四海所傾慕」^[22]，被比作北宋范仲淹、司馬光式的人物，卻無際遇成就范、馬的事業。

文天祥《宋史》有傳，二十中進士，殿試時「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不為稿一揮而成，帝親拔為第一。」^[23]意氣風華的文天祥，一心報理宗的知遇之恩。咸淳九年(1273)夏，文天祥和他的老師江萬里在長沙談及國事。江萬里對其寄予厚望：「世道之責，其在君手！」^[24]開慶元年(1259)，理宗授文天祥為承事郎、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公事，恭帝德祐元年(1275)，在知贛江任上起兵勤王，前後十七年，文天祥數次被彈劾、兩次罷官歸故里。開慶元年，蒙古南下圍攻鄂州，董宋臣獻策遷都四明，文天祥直言「余以為今日之事急矣，不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25]，而無人理會。景定三年(1262)，文天祥時任秘書省正字、景獻太子府教授、殿試考官等職，忠心耿耿、才華橫溢，理宗也說「聯將老，汝之才，而極其用焉。」^[26]然而，次年理宗再次起用董宋臣，文天祥上書自免罷歸文山。

咸淳六年 (1270)，襄陽被圍三年，賈似道要脅度宗，時學士院權直文天祥，代擬挽留賈似道的制誥，直言「蓋常情以去就為輕，惟大臣以安危為重」，暗諷賈似道，斥其「以疾為故告休」^[27]，引致賈似道不滿，並遭到台官彈劾。再次罷還文山的文天祥，只能在山水間釋放心中的不快：「日日騎馬來山中，歸時明月長在地。」^[28] 文天祥對朝廷一片赤誠，卻屢次遭到論罷。與同榜者「無不登進」，文天祥卻「雁恤在外，尚遲向用」^[29]。

謝枋得，宋季名士，寶祐四年 (1256) 進士。廷對時，「以丞相丁大全為答」，抨擊權相專權，「頗忤上意」，以第二甲第二人的身份授撫州司戶參軍。景定五年 (1264)，謝枋得在江東漕闡任上，「其《江東十問》備陳賈似道景定以後政事，知國家必亡於權臣之手」，「《八陵一問》，讀之使人淚下。」^[30] 因而落個訕謗罪，被竄興化軍。謝枋得鬱鬱不得志，「三十而入仕，五十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養親。」^[31] 觀其述懷詩《疊山集》中《謝劉純父惠布》、《謝人惠米線》、《謝張四居士惠紙衾》、《謝人冬至送鴨酒》等，憤慨之意盡在其中。

宋季士大夫，江萬里、文天祥、謝枋得諸人，素有文才、吏才，存「致君堯舜」、忠君報國之心。他們都是有宋「崇文」風氣下，涵養起來的士大夫，素有北宋以來士大夫特有的「心懷天下」之人格精神，卻遭遇了宋季「賢者不得行道」的蒼涼。

「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堯舜也」^[32]，然而宋季不是禹、稷所能自處的時代。江萬里、文天祥、謝枋得三人，均被庸君權臣羅織陷害，無法施展自己的抱負，甚至皇帝的眷顧也不能改變被權臣擯棄的不堪遭遇。江萬里入仕前名動東宮、文天祥少年得志、謝枋得文才吏治，均未能給他們帶來人們所想像中的君臣相遇、成就一番洪業；現實的遭遇卻是「微露鋒穎，輒見擯斥」^[33]，最後均落得悲壯殉國，令人扼腕。此種有才志士「忠而被疑，信而被謗」，才能被泯滅的現象，加

速了趙宋的衰亡。

三、不肖者得行無道

宋代士大夫基於「同治天下」，對朝廷敞開心扉，「憂樂天下」^[34]。然而，宋季庸君權臣對人才肆意欺凌打擊，造成了人才的缺乏與奴才的興盛。時人陳亮規勸當權者要善待士大夫，「勿以其可以爵祿誘，奴使而婢呼之」^[35]。宋季政壇遍佈的不是德行文章，而是順應當權者的意志與士風的潮流，滿朝充斥著一批有才無行或無才無德的庸陋之士，成為「不肖者」的天下。

南宋中後期，奸臣史彌遠、史嵩之、董宋臣、丁大全、賈似道等人先後佔據相職，造成宋末政風墮落。而且，當深受權相操控的台諫，或受制於功名利祿，甘當權相的幫兇；或因一己私利，將國本已弱的趙宋王朝導向更加混亂不堪。如史彌遠擅權時期 (1208-1233)，便依賴於「三凶」梁成大、李知孝、莫澤與「四木」薛極、胡集、聶子述、趙汝述等台諫群體，肆意彈壓不同政見者。

梁成大，字謙之，史稱其「天資暴狠，心術嶮巇，凡可賊忠害良者，率多攘臂為之。」^[36] 在理宗寶慶、紹定間 (1225-1227、1228-1233)，職任先後由通判揚州遷為宗正寺簿、監察御史、右正言、左司諫、宗正少卿、權刑部侍郎等。寶慶元年 (1225)，在史彌遠授意之下，論真德秀「大佞似忠，大辨若訥」，言魏了翁之「罪大罰輕」，將二人趕出朝廷。次年，史彌遠為進一步排斥異己，梁成大再次以「莫須有」的罪名攻訐罷免徐煊、胡夢昱、楊長儒等人。《鶴林玉露》載臨安太學生譏諷梁成大曰「梁成犬」，作者羅大經也指出，「受權貴之內則剪天子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母」^[37]。可見，在宋季史彌遠擅權時期，台諫橫行無忌。

不肖官吏的典型當屬陳宜中 (1234-1283)。寶祐年間 (1253-1258)，陳宜中和黃鑄、劉黻等六位太學生聯名上書攻丁大全 (1191-1263)，搏得「六君子」的好名聲。其本人在賈似道任相後，因通時務被委以重任，成為後者的得力助手。蒙元



兵鋒南下，在賈似道督兵江上時，「以宜中受卵翼之恩，且柔順易制，委以國」，在趙宋兵敗蕪湖後，陳宜中立改柔順之貌，即刻上書，「首劾賈罪以自解」^[38]，劃清和賈似道的界限。

陳宜中在賈似道死後，被拜右丞相，藉口與左丞相王爚不合^[39]，逃避相職，離職回家；後在太后寫信、其母勸說之下，返回朝廷。在蒙元破常州後，陳宜中又哭請太后遷都，自己卻蹤影全無。伯顏兵臨城下，陳宜中受命談判，又臨陣脫逃。在此危難情形下，張世傑、陸秀夫奉二王至溫州。端帝病亡之後，陸秀夫另立一帝，陳宜中南奔占城，後亡於暹羅。陳宜中在宋亡之際多次逃遁，「忠孝之誼，兩無所據。」^[40]多次挑起內耗，在個性上優柔寡斷、懦弱貪功，加速了趙宋的滅亡。

留夢炎(1219-1295)，淳祐四年(1244)狀元。其為人奸詐，見風使舵，在宋季官場步步高升。德祐元年(1275)，拜右丞相，稱病不出；在太后的要求下勉強任職，旋即逃遁；元兵破臨安，則投降仕元。同是宋季狀元宰相，其與文天祥在宋亡前後的表現迥然不同。

綜觀宋季末世，留夢炎只顧身家性命，毫無忠君愛國之心，陳宜中在宋季渾水摸魚，始終高位，梁成大等人無視道德準則，惟利是圖，可謂是對「不肖者得行無道」的最佳詮釋。

四、士風澆薄與宋之衰亡

除「賢者」與「不肖者」外，士人中的絕大多數是「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的「中人」^[41]。他們既無賢者節操不改的堅持，也沒有不肖者的大奸大惡，在現實生活中深受群體士風的影響。^[42]前文「不肖者得行無道」，改變了士大夫主要群體「中人」的士風，造就了宋季「士風澆薄」的局面。

戴栩，字文子，永嘉人。嘉定元年(1208)進士。為太學博士遷秘書郎，出知臨江軍，後為湖南安撫司參議官等職。存《浣川集》十卷。四庫館臣《〈浣川集〉提要》考證其人：「史彌遠柄國之時，栩獻詩諛頌」，在胡知柔忤彌遠謫赴象台

的時候，又「賦詩贈行，深致惋惜」。^[43]前後判若兩人。檢之《浣川集》，確有《上丞相壽》、《賀丞相家廟詩》等諛媚詩作，皆作於寶、紹間史彌遠極盛之日，極盡誇張阿諛。這也是宋季士大夫戴栩之流在動盪政治中的處世之道。

另一類「中人」則是趙汝騰、徐霖之流。他們深受宋季道學僵化矯激之病浸透。趙汝騰(?-1261)，寶慶二年(1226)進士，官端明殿學士、提舉祐神觀、兼翰林學士承旨。生於朱子之鄉的趙汝騰以道學標榜，在朝時守正不撓，然而也深深地打上典型的道學士人之病，周密記述，趙汝騰為搏得高位，屢有召命而不就，後來，「除著作郎，則翻然而來，舉止顛怪，妄自尊大」^[44]

徐霖，是當時有名的狂生，凡士子之來受教皆拜庭下，霖危坐受之不發一語。以道學自命，卻又固名貪財，屬於道學末流的典型。然而，趙汝騰在《庸齋集》中多有對徐霖無限推許，與其惺惺相惜。如《贊徑阪使君柯山講席之盛》詩云：「立天地心鳴道鐸，開生靈眼識師儒。」^[45]將其譽為朱子以來不世之才，將他與范仲淹相提並論。在趙汝騰和徐霖身上，我們可以發現，宋季盛行的道學之風中，士大夫群體多數孜孜於矯激沽名，已不能正確地認識外界、客觀地評價自己。

戴栩左右逢迎、趙汝騰道學虛名，都深受當時澆薄士風的影響。「士風、人才關係氣數」^[46]，澆薄士風帶來人才匱乏，最終致使宋季氣數將盡。特別是宋亡之際，「滿朝朱紫盡降臣」^[47]的遁降之風中，王應麟、陳文龍、家鉉翁等知名士大夫皆在朝廷敗亡之時，遁跡隱逸於山林，他們的選擇多出於無奈。

真德秀(1178-1235)曾坦言，「人材圯陋，士氣摧頹」^[48]，直言士風之衰和人才之頹敗。文天祥寶祐四年(1256)在《御試策》指出，「士習厚薄，最關人才，從古以來，其語如此」，將宋季人才匱乏的原因直指士風頹喪，且士大夫之家，「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49]當時，在教育觀念與方法上急功近利，蠅營苟苟不

良官場士習，對當時的社會人心造成極大損害。真德秀、文天祥二人作為經歷者，均道明瞭士風頹喪對於人才的摧抑作用。

宋季世風沒落、士風澆薄，一如前文。權臣的高壓政治和道學的官方化，均對士人造成了考驗。同時，眾多士人薄弱的經濟基礎和狹隘的進身之階，與功名利祿的誘惑形成強烈的心理落差。對此，文天祥曾經呼籲改變士風是「淑士之道」，「士風一淳，人才或於是而可得矣。」^[50]

北宋以來，以范仲淹、歐陽修為代表的士大夫群體構建起來的「重義輕利」這一傳統儒家基本價值觀，在社會衰敗、士人群體道德水準下降的情況下，失去了社會約束功能。王安石筆下佔士大夫群體多數的「中人」，選擇了隨波逐流、隨遇而安。這些受士風影響的士人中不少才能出色之人，他們本應是社會中堅，為救亡圖存作出自己的貢獻。然而，他們囿於既得利益，趨於隨波逐流，而無法成為真正的人才，甚而滑入不肖者的行列。

五、結論

宋季理宗、度宗、端宗三朝是典型的衰亡之世，其國勢「宜強而日趨於弱，宜安而日趨於危」^[51]，賢者消弭、不肖者充斥，「江南無人才」成為宋季時人的普遍憂慮。表面上看來，像治世般風平浪靜；實際上，吏道不清、士風澆薄、百物踴貴，趙宋君臣卻束手無策。然而，宋季並非沒有人才，「江南無人才」的本質是宋季三朝不良的政治環境與士風，埋沒、消弭、扼殺了人才，最終形成前揭羅大經筆下「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的局面。

實際上，這種不良的政治風氣，源於南宋文化「在本質上趨向於內斂」^[52]。南宋前期以來高宗放任權相秦檜動用文字獄的手段，大規模整肅持異見的官僚士大夫，嚴重衝擊了北宋激揚剛直的士風，士人政治缺乏進取精神，趨於圓熟謹慎，北宋以來「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終至低落。士氣的低落帶來了兩個惡果：一是自持操守

的「賢者」「中人」，或不得行道，或避禍噤聲，使正氣不張；二是鮮廉寡恥的「不肖者」，因諂媚如魚得水，官運亨通，導致政風大壞。這種高宗秦檜時期以來相反相成的政風，造就了宋季官場言不由衷、無所作為乃至見風使舵、阿諛逢迎的風氣。正如王夫之在《宋論》裡所說，先是南宋高宗朝秦檜專權下「群情震懾，靡所適從」，其後韓侂胄、史彌遠與賈似道「取天下之士氣抑之割之」^[53]。南宋投降時，代表最後尊嚴的祈請使，左丞相吳玠、右丞相賈餘慶、樞密使謝堂、參政家鉉翁、同知劉岳等五人，除家鉉翁外，四位皆是無恥怯懦之人。^[54]

宋季三朝苟且萎靡的政風，失卻北宋士大夫剛直勁挺的銳氣，給王朝政治帶來非常嚴重的後果。各種矛盾的總爆發，意味著改朝換代的到來。趙宋遺民在《宋季三朝政要》中分析宋亡的原因：「國之興亡系乎天數，而亦關乎人才之盛衰。」其中，「天數」是虛無的言辭，而士風澆薄下人才的消弭則是宋亡的重要原因，留給趙宋遺民的，只能是「雖有忠良之臣，反擯棄而不用，束手待斃」^[55]的沉痛反思。

**基金專案：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
「南宋前期財政研究」(21FZS046)·廣州市
哲學社會科學 2024 年度共建課題「中國古代
監察制度的結構變遷與運作有效性研究」
(GZGJ227)。**

^[1] [元]方回：《左史呂公家傳》，呂午《左史諫草》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27冊，第408頁。

^[2] [宋]謝枋得：《新刊重訂疊山謝先生文集》卷1《上丞相劉忠齋書》，宋集珍本叢刊本（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第87冊，第364頁。

^[3] 郭學信：《宋代士風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對兩宋社會歷史風貌中士人多元化的人格特徵進行了研究。沈松勤：《南宋文人與黨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以「史學入而文學出」的研究方法，關注南宋文人與黨爭現象，涉及處於政治漩渦中的士大夫的精神領域。均未涉及趙宋衰亡歷

- 史中士風澆薄與人才頹敗的問題。
- [4] [元]佚名：《宋季三朝政要箋證》卷5，德祐元年三月壬申（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393頁。
- [5] [明]錢谷：《吳郡文粹續集》卷14《重建範文正公祠堂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385冊，第345頁。
- [6]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113頁。
- [7] [元]脫脫：《宋史》卷471《奸臣一·序》（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3697頁。
- [8] [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下「道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169頁。
- [9] [宋]魏了翁：《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8《應詔封事》，宋集珍本叢刊本，第76冊，第763頁。
- [10] [宋]程東鳳：《全宋文》卷8239《上度宗皇帝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358冊，第29-30頁。
- [11] [宋]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卷13《真州雜賦》（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01-502頁。
- [12] [宋]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卷16《至廣州第七十七序》（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45頁。
- [13] [宋]鄭思肖：《鄭思肖集》、《中興集後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0頁。
- [14] [宋]陳亮：《陳亮集》（增訂本）卷2《中興論·論開誠之道》（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6頁。
- [15]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卷3《末世風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65頁。
- [16] 有關此一北宋前期士大夫主體人格的研究，可見拙文〈歐陽修「新五代史」與北宋士大夫精神〉，載《河南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
- [17] [元]脫脫：《宋史》卷418《江萬里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2523頁。
- [18] [宋]周密：《癸辛雜識》後集「太學文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65頁。
- [19] 同注[17]，第12524頁。
- [20] 同注[17]，第12524頁。
- [21] 同注[17]，第12523頁。
- [22] [宋]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卷6《賀江端明》（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2頁。
- [23] [元]脫脫：《宋史》卷418《文天祥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2533頁。
- [24] [宋]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卷17《紀年錄》（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91頁。
- [25] [宋]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卷3《己未上皇帝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5頁。
- [26] 同注[24]，第687頁。
- [27] [宋]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卷3《又擬內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2頁。
- [28] [元]劉一清：《錢塘遺事》卷5「竄謝枋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5頁。
- [29] [宋]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卷17《紀年錄》（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89頁。
- [30] [元]佚名：《昭忠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51冊，第247頁。
- [31] [漢]王充：《論衡》卷1「逢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頁。
- [32] 同注[17]，12533頁。
- [33] 同注[29]，第709頁。
- [34] 王瑞來：《天地間氣：范仲淹研究》（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8頁。
- [35] [宋]陳亮：《陳亮集》卷2《中興論·論開誠之道》（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6頁。
- [36] [元]脫脫：《宋史》卷422《梁成大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2621頁。
- [37]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2「大字成犬」條（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74頁。
- [38] [元]佚名：《宋季三朝政要箋證》卷5，德祐元年三月辛巳（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403頁。
- [39] 詳見拙文：〈宰相王燾與宋季救亡圖存考論〉，載《歷史教學問題》2019年第1期。
- [40] [元]脫脫：《宋史》卷418《陳宜中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2531頁。
- [41] [宋]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卷1《御試策一道》（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8頁。
- [42] 傳統士人秉持孔子主張的仕宦思想，所謂「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國家有道時，出來做官；國家無道時，把正確主張收起來辭官隱居。楊伯峻譯注：《論語·衛靈公篇第十五》，（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63頁。當代著名學者錢穆先生也高度概括內斂型人格特徵的中國傳統士大夫在衰亡之世，「仍可自求有得，其所得乃在道。行道有得，得於己之謂德」；錢穆：《中國歷史精神》附錄《從中西歷史看盛衰興亡》（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74頁。當正面因素佔上風時，他們會趨向光明磊落的人格；當負面因素佔上風時，他們會不可避免趨向同流合污。
- [43] [清]永瑤等撰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62《浣川集》（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374頁。
- [44] [宋]周密撰，吳企明點校：《癸辛雜識》別集下《徐霖》（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179頁。
- [45] [清]永瑤、紀昀等撰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提要》卷 164《庸齋集》（北京：中華書局，2016 年），第 1403 頁。

[46]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 34，淳祐十二年六月戊辰（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992 頁。

[47] [宋]汪元量：《增訂湖山類稿》卷 1《醉歌（其十）》（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第 16 頁。

[48]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 39《謝林侍郎薦舉啟》，宋集珍本叢刊本，第 76 冊，第 384 頁。

[49] 同注 [41]，第 80 頁。

[50] 同注 [46]。

[51]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 51《輪對劄子》（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9 年），第 47 頁。

[52] [美]劉子健：《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36 頁。

[53] [清]王夫之，舒士彥點校：《宋論》卷 15《度宗》（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第 173 頁。

[54] [宋]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卷 13《留遠亭》序（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490 頁。

[55] [元]佚名，王瑞來箋證：《宋季三朝政要箋證》卷 6，祥興二年二月癸未（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第 509 頁。

An Analysis of the “No Talents in Jiangnan” in the Song Dynasty

Wu Yeguo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Confucian scholars who grew up in the “Chongwen” culture of Zhao Song, known as the spirit of “thinking the world”, suffered the sorrow of “the sages are not allowed to walk”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sages such as Jiang Wanli, Wen Tianxiang, Xie Yude and others have all had outstanding talents and talents, and they have the heart of “to the sage”, but it is difficult to change the ethos of defeat at that time. Those who “have no way to do anything”, such as Liang Chengda, Xue Ji and others, have changed the morale of Wang Anshi’s main group of “corporate people”, which caused the situation of the Song Dynasty.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sages of “the sages are not allowed to walk, the sinless people have no way to do it”, and the situation that the Song dynasty “there is no talent in Jiangnan” is annotated. The theory of “no talent in Jiangnan” was thrown out by the people at the end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it also became evidence of the death of the country.

Key Words: the end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Lizong, Duzong, Duanzong), Jiangnan no Talent, the Character of the Scholar, Dying.